

辯證與存在的選擇

——論馬爾庫塞社會批判理論的兩條線索

涂鵬

四川外國語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馬爾庫塞對馬克思的解讀代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做法，即對馬克思前期思想的強調。為此，他先是嘗試將馬克思與海德格爾進行結合，之後逐漸發展出兩條社會批判線索，一是黑格爾—馬克思脈絡下的歷史辯證法方法論，一是以早期存在主義為基礎的人本主義式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這種雙線發展的背後卻是馬爾庫塞在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理論與實踐、批判與重建之間的猶豫不決。透過馬爾庫塞的經驗，我們看到只有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化解讀，才能避免這種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困境。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的馬爾庫塞，一直致力於以理論為武器，揭露現代文明的困境，批判現代社會的歧途，在壓抑與異化的荊棘中探索救贖人性的道路。比起同僚，馬爾庫塞還特別注重實踐的力量，因而不斷在理論與現實的張力紐帶上尋找落腳點。

然而，這種看似良性的互動關係也潛藏著難以克服的悖論：一方面，馬爾庫塞強調理論凌駕於現實之上的“否定性”與“超越性”，並以此作為批判社會現實的依據；另一方面，由於其社會批判理論的實踐旨向，他又不得不時常修調理論，賦予它轉化為實踐行動的必要條件。如此一來，在變動不居的現實環境中，



馬爾庫塞及其社會批判理論始終面對著“超越”與“妥協”的兩難境地，這使得他的理論體系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相比，並非那樣“堅定”。

一 從海德格爾到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皈依

按學界的說法，¹ 馬爾庫塞的思想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28年他發表第一篇論文〈歷史唯物主義現象學論稿〉（*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² 到1933年加入“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馬爾庫塞在這一階段的工作是用黑格爾的歷史本體論和辯證法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改造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藉以批判傳統哲學的抽象性與非歷史性，並試圖發展出一套以現實為基礎、以實踐為目的、涵蓋歷史維度的批判哲學。

詳細來說，馬爾庫塞認為，海德格爾通過存在主義探討了人的“本真狀態”（authenticity），並展現了本真性在社會存在條件中被歪曲或遮蔽的過程，這為他的理論開啟了社會批判維度。但是海德格爾仍舊無法擺脫非歷史的局限，他忽視了諸多歷史現實成分，如“需求、階級、經濟和歷史特殊性”，把個人置於抽象的“世界性”（worldhood）構成，而非具體的“社會——歷史的世界”。³ 這需要歷史唯物主義的“填充”。

馬爾庫塞便開始著手前面提到的“改造工作”：他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此時主要通過盧卡奇），提出“具體哲學”（concrete philosophy）的說法，論證了哲學的“實踐科學”本質：哲學通過對實存領域的介入而實現其真理性的內在訴求。具體實存是“歷史”的體現，在當下即是由發達資本主義（“組織化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社會結構所規定的歷史處境。⁴



儘管馬爾庫塞對存在主義現象學進行了積極的改造，但海德格爾式的表述仍充斥著字裡行間，關於“具體哲學”的發展亦未能在具體社會現實中找到落腳點。不過，這種困局終於在1932年得到突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首次公開出版，它立刻成為西方學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核心文本，並為包括馬爾庫塞在內的諸多學者打開了新的研究進路。

手稿發行當年，馬爾庫塞便予以“開拓性的解釋”⁵。這不僅在於他對馬克思“人道主義”一面的揭示——該面向對於理解西方現代性問題具有重大意義，更在於他憑此找到了擺脫海德格爾陰影的途徑（此時，海德格爾已表明自己的納粹傾向，這促成兩者的決裂）。有了“人道主義”面向的助力，馬爾庫塞得以將馬克思的理論從經濟決定論中“解救”出來，由異化問題引出的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也能取代存在主義，同時兼顧人之本質與社會存在條件的討論。

理論上的“皈依”讓馬爾庫塞加入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變得順理成章，他也由此進入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此後一段時間，馬爾庫塞一邊將存在主義現象學劃入“傳統哲學”範疇，與其劃清界限並對其展開批判，一邊又遵循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脈絡來重構其社會批判理論骨架。他圍繞人之本質、異化、物化和勞動等核心概念，在具體歷史條件下，分析了人在勞動對象化過程中實現其本質的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商品和私有財產將人的本質和存在顛倒的過程（異化勞動產生的過程）。此後，針對法西斯政權的興起，馬爾庫塞還跟隨研究所進行了有關權威主義國家的研究，試圖在宏觀的政治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層面揭露法西斯主義與組織化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繫。至此，馬爾庫塞確立起貫穿其日後思想的一條基本主線——歷史辯證法方法論。



二 馬克思的堅定簇擁：歷史辯證法方法論的運用

前面已經提到，馬爾庫塞的思想並非連續的統一體，但歷史辯證法方法論的確立至少為他提供了清晰的思想發展主線，為他的社會批判理論事業輸送源源不斷的動力。正是仰賴它，馬爾庫塞才得以一邊立足於實踐，一邊完成對現實的否定和超越。

1. 對黑格爾的重新解讀：批判理性主義

進入第二階段，馬爾庫塞的主要工作轉向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全面批判。沿著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思路，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生髮出非人的異化現象，直至完成與法西斯主義的媾和，是因為其思想文化的“同一性”（identity）特徵導致對現實的肯定與屈從，而關鍵之處在於對待“理性”的態度。

在1937年的文章〈哲學與批判理論〉（*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馬爾庫塞首次系統地嘗試將理性納入歷史辯證法的體系，他深知要完成該任務必須回到黑格爾的脈絡。他先是點出理性在黑格爾語境下的批判潛能——理性引領著哲學思想去探求存在的本質並達至最終潛能，理性是判定既有現實是否合理的“批判的法庭”，它可以否定任何不合理的現實。⁶然而，傳統哲學觀念論把理性及其矛盾運動束之高閣，理性的辯證性被限於思想層面，無法涉入既有社會現實。所以它只有與批判理論結合，方才有機會將其否定性對準不合理的社會組織形式，為人的潛能的自由發展創造現實條件，這就是所謂的“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

可惜的是，馬爾庫塞的做法並未引發過多關注，反倒是二戰的爆發讓理性主義深陷懷疑與批判，連帶著作為理性觀念論集大成者的黑格爾淪為世人肆意攻擊的對象。但是現實的境況並未動搖馬爾庫塞的信念，他開始著手深化批判理性主義的實踐意義，



在理性與社會革命之間搭建橋樑，用理性的革命指向來澄清黑格爾的哲學，並梳理黑格爾與馬克思關於歷史辯證法的學緣聯繫。第二階段的代表作《理性與革命》由此誕生。

該書基本沿用了之前的分析，首先將黑格爾的哲學定調為“否定性哲學”。它的辯證性源於理性與現實的“非同一性”，即“理性對現實擁有最終權力”⁷，理性的自我實現就是不斷否定和超越不合理現實的過程。在論證了其內在合法性後，馬爾庫塞轉從理論的外部傳統來為黑格爾辯護。為此，他著力強調黑格爾辯證法對馬克思的啟發：馬克思通過歷史化和具體化的做法，把黑格爾的否定哲學改造為歷史唯物主義——否定的主體由抽象理性過渡到無產階級，因而具備了革命實踐的可能；“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也相應地表現為無產階級從否定異化的勞動分工，到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到最終廢除自身以實現本質解放這一革命過程。所以，馬爾庫塞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才是黑格爾哲學的正統繼承”。⁸ 他還義正詞嚴地把批判矛頭對準實證主義，指出正是因為實證主義祛除了辯證的邏輯，才失去了對既有社會現實的否定能力，這種全盤照收的態度與納粹思想的橫行形成了災難性聯繫。

《理性與革命》的確為當時處於風口浪尖的理性主義注入了新生，而馬爾庫塞也覺得找到了正確的批判進路，只是他並未意識到，他在將理性置於“批判法庭的法官”之位時，卻沒有將理性本身放入歷史辯證的情境中接受審判。直到1944年《啟蒙辯證法》的出版，馬爾庫塞方才意識到這一問題。

簡要來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對理性和啟蒙進行了顛覆性批判：通過揭示啟蒙與神化之間的隱蔽關係，⁹ 他們在啟蒙理性背後發掘出源於神話的等級制度，進而展現了啟蒙理性與人類統治結構的共謀歷史。在該書影響下，馬爾庫塞逐漸放棄批判理性主義的說法，轉而考察理性如何在歷史過程



中走向了辯證法的反面（形式化），最後在形式邏輯的支配下完成與資本主義社會統治結構的聯姻。

不過，《啟蒙辯證法》也促成了馬爾庫塞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的思想分歧。在涉及辯證法的批判基礎的主題時，馬爾庫塞相較後者更為樂觀，甚至激進。他覺得在否定現代社會的建構基礎後，大可不必畏手畏腳，關鍵在於如何找到新的基礎來組織重建。為了尋求一種非異化非壓迫的生存結構，馬爾庫塞把希望轉向人類最原始也最為隱秘的部分。

2. 對佛洛德的改造：愛欲的批判性

馬爾庫塞早在1920年代就注意到佛洛德的思想，在1938年的論文〈論快樂主義〉（*On Hedonism*），他首次系統論述了需求、感覺和幸福等主題。¹⁰ 受此影響，《啟蒙辯證法》之後，馬爾庫塞進入思想發展的第三階段，即在人性固有的必然結構裡探尋社會重建的基礎以及革命實踐的主體條件。

經歷《理性與革命》的體系化後，馬爾庫塞對歷史辯證法的運用更為成熟，《愛欲與文明》中已能清晰辨明他遵循辯證法展開批判的思路：面對佛洛德提出的本能與文明的對峙關係，馬爾庫塞先是把兩者放入具體的社會情境和歷史過程中予以重新解釋，一邊利用本能對現實的否定傾向來挑戰社會的統治邏輯，一邊又嘗試推翻佛洛德關於文明與壓抑相生相伴的論斷。

事實上，深入剖析佛洛德的本能結構就能發現一個重要的二重矛盾，即“生命本能”（life instinct）和“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對抗以及它們與文明的衝突：一面，文明改造和利用了死亡本能，形成人格結構中“超我”的部分，並逐步演變為現代社會的道德。但死亡本能的破壞性也被保留下來，對外表現為外部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對內表現為超我迫使自我與本我對立，進而分裂了完整的人格；¹¹ 另一面，等同於愛欲的生命本能可以



將人融合進更大的共同體，它是文明的根底。可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開始創造各種禁忌對愛欲實施壓制，以馴服性本能中難以駕馭的部分。可最為詭吊的地方在於文明由此陷入了“毀滅性辯證”（a destructive dialect）的困局：人們曾用生命本能牽制死亡本能，用愛欲抵禦破壞力量，但文明的進步伴隨著對兩種本能無差別的抑制，這種壓抑反而助長了毀滅的衝動，文明就必須採取更強硬的壓制手段予以回擊。¹²

在馬爾庫塞看來，佛洛德只是在非歷史的敘事環境中道出了本能與文明的辯證關係，只要回到歷史，文明與壓抑的共生困局便迎刃而解。馬爾庫塞決定追溯至矛盾的源頭，通過區分“缺乏的事實”與“對缺乏採取特定形式的組織所產生的後果以及由該組織強加的特定存在態度的後果”，¹³把佛洛德的超驗心理學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聯結起來。¹⁴在這種區分下，壓抑亦可被分為“基本的”與“剩餘的”（受馬克思“剩餘價值”概念的啟發）。儘管兩者都是現實原則的表徵，但前者是人類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接受的本能約束，後者則是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產物，它說明了“缺乏的事實”及其後果被特定社會集團用來組織和分配的事實，也促成了壓抑從個人層面的生物必然性溢出至社會範疇和政治領域，個人故此遭受著雙重壓迫。而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分工體系正不斷加強、深化和再生產著剩餘壓抑，並以此作為自身運作的動力以及合法性來源，個人身體和心靈遭受的壓迫也在壟斷資本主義這裡達到了巔峰。

正是通過把辯證法放回歷史的做法，馬爾庫塞找到聯結馬克思與佛洛德的突破口。歷史辯證法讓他看到，即使這般壓抑不堪的社會結構亦存有解放的前景和超越的可能，因為剩餘壓抑存在的特定社會條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形式）已被揭露，那麼只要廢除這種不合理的生產方式，就能夠消除剩餘壓抑得以繼續的具體條件，從而為它的徹底消除奠定基礎。如此一來，以資



本主義制度為革命物件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必定會完成這一歷史性壯舉。

此外，馬爾庫塞還在哲學層面還原了愛欲和邏輯的辯證關係。他的學生芬柏格曾說道，馬爾庫塞畢生的學術抱負都可概括為“在歷史中恢復人的本質”。為此，他不惜追溯至辯證法的源頭，即古希臘哲學中關於愛洛斯（Eros）與邏各斯（Logos）的辯證關係的討論——這樣才能避免因本質的本體論解釋而倒退至先驗的形而上學，也能防止因完全拒絕本質而淪為相對經驗主義。¹⁵

依照馬爾庫塞的解讀，愛洛斯和邏各斯是愛欲與理性的內核，兩者的鬥爭史推動了整個西方思想史的演進：亞里士多以降，邏各斯逐漸形成了對愛洛斯的壓制局面——邏各斯的形式化一面讓它失去了否定和超越的能力，一面促使理性走上以生產為目的的異化之路，並生髮出與“滿足邏輯”相對立的“統治邏輯”。在黑格爾為邏各斯的歷史劃上完美的句點之後，哲學只有在理性的統治下另闢蹊徑（以叔本華和尼采為代表）。這一脈絡終於在佛洛德這裡得到突破：“愛欲”成為文明的根底，即一種尋求結合的生命本能。與邏各斯相比，它才是存在的本質，因為依據快樂原則建立的滿足邏輯可以讓人在幸福且自由的社會情景中充分展現自己的本性，實現自己的潛能。遺憾的是，文明與理性的註定糾纏壓制了愛欲的存在空間，也將人帶入不幸的深淵。但馬爾庫塞並不認定這是文明的宿命。在佛洛德的基礎上，他論證了依靠愛欲來建構非壓抑性社會的可能，借此延伸出文明歷史的新階段。可見，愛欲在揚棄對自身的否定之後在更高層面上完成了自我歸複，就辯證法本身而言也以進階的形式重現了它在柏拉圖那裡的樣態。

3. 對現代社會的把脈：歷史辯證維度的喪失

《愛欲與文明》出版後數年，事態未如馬克思所設定的那樣進行，亦未如馬爾庫塞所預期的那樣發展。馬爾庫塞逐漸轉向對



現代社會的診斷與批判。在《單向度的人》裡，他將歷史辯證方法論用於社會批判的意圖更為明顯。

僅從書名就可看出，他批判的物件是一個缺失否定維度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該社會用各種新的控制方式將人的意識和行為模式限定於既有社會秩序，任何變革和超越的可能都被統治手段所同化，馬爾庫塞稱其為沒有否定性和“歷史替代”（historical alternative）可能的肯定性社會。

更糟糕的是，在單向度的思想中找不到“辯證”和“歷史”的地位。如前所述，辯證思維的源頭可追溯至柏拉圖的理念論，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它給出了“思想—現實”的矛盾結構，為西方而上學的發展提供持續的批判動力。然而，自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以降，思想與現實的辯證關係便走上了非歷史的形式化道路，並在發達工業社會達到極致。其後果便是，思想通過高度形式化與現實保持等價，兩者被同一到單一向度——一邊是思想丟棄了否定的力量以致於不能再以理論或實踐的真理之名來反抗既有現實，一邊是現實本身在“自在”的層面上不再包含存在的潛能，繼而退出了辯證的歷史發展過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似乎可以把各種反對勢力都整合進自己的發展邏輯，它就是新時代的極權體系，它的強大、堅固、封閉使人找不出可以攻克的薄弱環節。

反之，馬爾庫塞心中理想的社會形態應是“雙向度的”，即擁有辯證的邏輯和歷史的維度。在古典辯證法的表述中，思想與現實的緊張關係蘊含著指向真理的判斷，即“應然判斷”（oughts）——它往往立足於一個高於現實的概念或理念來否定其中的各種事實表像。如此一來，思想不只因表達了存在本質的潛在可能性而具有“至善”的道德意涵，它還因實實在在地要求對既有秩序的否定和顛覆而顯露出具體的實踐意願，這構成了馬爾庫塞希望看到的雙向度邏輯，即“對現實的肯定和遵從以及對應的否定和超越”。¹⁶



但古典辯證法仍不失為一種關於真理的本體論，它固有的缺陷將其否定能力限制在抽象層面，從而不可避免地走上邏輯形式化，乃至意識形態化的道路。故而馬爾庫塞指出，當務之急是把本體論辯證法改造成歷史辯證法，這樣才能真正保留批判和否定的邏輯。這一次，他選擇了技術批判理論的進路。

在《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借用海德格爾關於技術與現代性的討論為出發點，重申了技術與生俱來的政治偏好以及它對辯證思維的侵害：理性的形式化傾向使理性自身屈從於形式邏輯（特別是數理邏輯）的普遍規則，而失去否定的向度和辯證的能力。幾乎同期，技術也完成了現代化的蛻變——它拋棄了古代“技藝”的存在特徵，不再以至高至善的理念為目的，甚至拒斥任何圍繞目的和價值的選擇或判斷，而只關注達成特定目的的手段，工具性成為它唯一的面向。結果，兩種傾向的天然親和促成了技術理性在現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事實，它已變身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支配人與自然的“新的神話”。更有甚者，技術理性的盛行還詮釋著霍克海默所謂的“主觀理性”戰勝“客觀理性”的過程——技術理性以及由技術理性構造的客觀世界將價值逼退至純粹主觀的領域，認識論和倫理徹底分裂，¹⁷ 而失去價值向度的技術理性更易淪為主觀意願的工具，被用來維護個人利益或特定團體的統治。

在具體社會現實的分析中，馬爾庫塞還將發達工業社會的反動情況歸因於“技術理性”。正因技術理性成為新的社會意識形態，才讓社會統治更為體系化和合理化。更隱秘的危害在於技術理性的“中立性”：在技術理性的話語體系裡，對效率的追求蓋過了一切實質性對立，任何社會或政治問題都可被轉述為技術問題，讓問題在既有社會結構內得到解決。這種無反思、無批判的肯定性思維不但是社會統治的工具，更是極權主義滋生的思想溫床。至此，科學被降格為“中立性的”操作技術，並進一步淪為



統治自然與控制社會的工具。無論建立在肯定性之上的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還是自帶顛覆傾向的藝術都被納入既有社會結構，無法表達批判的意指。

4. 新的希望：解放的辯證法

隨後，歷史的轉折如期而至。盛行於西方社會的新左派思潮讓馬爾庫塞看到其批判理論付諸社會現實的希望，也讓他找到了辯證法的現實承擔者，他對辯證法的解釋也隨之帶上政治性色彩。

受新左派思潮激勵的馬爾庫塞更加重視歷史辯證法的革命意義。在論述烏托邦的新前景時，他不斷強調當前社會已抵達徹底革命的臨界點，只是人們缺乏與既有社會秩序決裂的決心，這使得辯證歷史遲遲不能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對否定人之本質的異化勞動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全否定，故此為壓抑性社會留下殘喘之機。他引用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之前的歷史都是人類的‘前歷史’（prehistory）”¹⁸，以此佐證社會主義及其革命在辯證歷史中的地位：新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應有全新的原則和邏輯，以擺脫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的病態崇拜以及隨之而來的異化與壓抑。所以，社會主義革命絕不同於在資本主義既有社會結構內進行的簡單“改革”或“改良”，它不是在單純數量意義上提高需求的滿足程度，而是做出根本性的質的變革，廢除從勞動分工到商品社會的種種不合理制度，讓道德的、審美的需求佔領人的生活世界，並以此建立非壓抑的社會秩序。¹⁹

另外，馬爾庫塞還利用黑格爾辯證法中“確定性否定”的概念來解釋社會主義革命與當前資本主義的關係：儘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嶄新的社會形態，但不論其生產組織方式，還是階級構成或文化表現都並非憑空而來，它們是“否定之否定”的最高環節——既包含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也吸



收了整個人類“前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因此，社會主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烏托邦，它擁有極高的生產力水準作為現實基礎，並以人類本質存在的歷史狀況為發展依據，反映的是整個辯證歷史總體。相應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以上述歷史為依託而對既有不合理秩序發起的辯證性否定，絕非資產階級所污蔑的那樣，是虛無的無政府主義“暴亂”。

三 與海德格爾的交織：對人之存在的思考

馬爾庫塞曾不止一次表示，社會批判理論的目的不單單是改造制度，更需要把變革深入人的意識直至本能。它的根本目的在於消除壓抑性的社會結構，創造一個有利於人之本質自由發揮和實現的社會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理論的實質是關於“人”的理論。

馬爾庫塞對馬克思的人本主義解讀很大程度上可歸結於海德格爾的持久影響。在晚年一次訪談中，馬爾庫塞對此直言不諱：“我們在海德格爾那裡發現了我們曾經在胡塞爾那裡發現的東西：即一種新的開端，一種新的願望，以便把哲學置於真正具體的基礎——讓哲學關注人的生存、人的條件，而不是那些純屬抽象的觀念和原則”。²⁰ 如前所述，即便在他決心脫離海德格爾的學術圈而轉投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後，他的理論焦點和現實考量仍與前者的核心問題高度重合，即“對人的存在條件的關注”。因為在他看來，不論馬克思還是海德格爾都試圖對西方哲學傳統撥亂反正，“使之朝向矯正人類生存環境缺陷的實踐目標”，並把對“世俗”和“實踐”的要求置於純粹的理論思辨之上。²¹

如果說海德格爾啟發了馬爾庫塞的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路線，那麼《歷史與階級意識》和稍後問世的《1844年經濟學一哲



學手稿》讓他的人本主義關懷找到具體落腳點，使其得以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語境下探討人的本質及其存在，特別是人在現實社會狀況的處境。前面章節曾提及，雖然馬爾庫塞在“存在”與“本質”的抉擇中選擇了後者，但這絕不意味著他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是一種抽象的本質主義。他關於人之本質的討論始終涉及其存在條件，只不過這種存在條件不再以海德格爾式的形而上話語表述出來，而是通過歷史辯證法得到揭露和批判。

如此結合便是馬爾庫塞早期思想的核心工作。簡言之，他從勞動本體論出發，通過考察勞動這種最本質的人類實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變異形式——異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存在條件對人之本質的壓抑和歪曲：異化的勞動分工使勞動由實現人之本質的方式淪為維持生存的手段，而這種本質和存在的顛倒又導致本應屬於勞動者的勞動對象、勞動過程再到勞動者的人性都裂變為外在強制，因而給人強烈的異己感和壓抑感，終於讓人的生存狀況陷入絕境。

儘管這種結合的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存在主義的影響仍深烙於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以先前分析為例，雖然《愛欲與文明》運用歷史辯證法的宏大框架重釋了文明與壓抑的關係，但馬爾庫塞尤其反對把社會批判的框架（不論馬克思，還是海德格爾，抑或佛洛德）抽象為客觀規律，其實際關心的內容仍是作為意識主體的個人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況。

根據以上思路，馬爾庫塞的首要工作是為存在的主體奠定一個現實的本質基礎，以避免形而上的存在主義論述。為此，他又一次搬出柏拉圖和佛洛德的解釋來佐證愛欲作為人之本質的表徵：前者認為愛欲的欲求內容是對“善”（the good）的永恆擁有，²² 欲的經歷是人由可變的感覺或意見通往永恆真理的過程，用現代哲學表述就是，愛欲推動著我們透過各式各樣的現象去把握穩定的本質；後者將愛欲等同於一種尋求結合的生命



本能——愛欲的目的是恢復生命結合的形式，由此指向一種高於個人的整體性。故而，佛洛德的愛欲概念突破了狹義的“生殖之性”的定義而具有“人的本性、性質之意”。²³

有了人之存在的本質（本能）作為社會批判的基點，馬爾庫塞便可大膽地展開愛欲與文明的辯證關係。此時，他的重心轉向揭露“人之本質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如何被遮蔽或是如何得以實現”這一問題，而這與海德格爾關心的“本真的或非本真的歷史性存在”形成了同構。

如前所述，無論是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別是勞動分工體系）對愛欲的禁忌和壓制，或是用愛欲為人類勾勒出可期的前景，馬爾庫塞都沉浸於“人”以及“人之存在”的主題。他批判的目的並未停留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判斷，而始終落腳於現實層面的生存狀況（如他關於個人負罪感的產生、履行原則對個人力比多的壓抑、個人工作狀態、性欲的“昇華”等論述）。這既是他對在“具體哲學”中提出“實存領域”的再表述，²⁴也是他與當時“科學主義式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的主要面向——因為他最終希望為人類找到一個“本真性社會”，讓人們可在其中充分實現自身潛能並最終完全展現存在的本質。

“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構成《單向度的人》的分析主線。首先，“單向度的人”這一標題再次表露了貫穿馬爾庫塞後期社會批判理論的意旨：如果說“單向度”是他辯證法方法論的批判物件，“人”在這裡就是人本主義關懷的陳述；其次，馬爾庫塞對本質的存在狀況的關注仍多於對本質本身的探求：他把現代文明的歷史看作人的本質逐步退隱的過程。曾幾何時，歷史辯證法允許人性的充分展現和潛能的自由實現，但從辯證邏輯到形式邏輯再到更為嚴苛工整的數理邏輯，一路下來，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倚靠自身與“有計劃的、科學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²⁵的天然親和，完成了與現行統治的合體。在其虛偽的價值



中立話語中，本質要麼躲入“物自體”的軀殼下成為“不可說之物”，如分析哲學的處理方式，要麼被數理邏輯進行粗糙淺簡的量化解釋，抑或淪為霍克海默所說的“主觀理性”的產物。不管哪種方式，人性與人的潛能都受到單向度邏輯的無情壓抑而失去討論和發展的空間。按照芬柏格的說法，現代性將本質視為主觀的和武斷的，必須將其消除並取而代之以技術來表達人的意志，可它帶來的副作用是讓人對世界的肆意妄為成為可能。²⁶

還需注意的是馬爾庫塞以存在主義視角看待單向度社會的方式。麥金太爾曾批評馬爾庫塞把“發達工業社會”當作一個統一體而忽略了政治傳統、文化制度和自由意志等因素的影響。²⁷若干年後，沃林從存在主義出發，給出了有力辯護：馬爾庫塞探究的實質並非單向度的社會本體，而是現實的社會結構和統治秩序對個人的強制和壓抑，即在“一個非本真的世界——一個盲從的大眾社會”中尋找個人異化的根源，可見，這裡的根本問題是“社會的”而非“本體論的”。²⁸馬爾庫塞的真實意圖是呈現人之本質被異化的整體性社會條件，並藉以找尋消除這些條件繼而恢復本質的可能。

沃林接著指出，可惜馬爾庫塞並未把這種“社會問題”與“本體論問題”的區分堅持下去。這是由於新左派思潮的盛行給予他極大的自信，讓他認為，假若能克服異化的社會根源，也就能隨之克服異化的本體論根源。²⁹的確，新左派奉行的許多主張（最典型的是反文化運動把馬爾庫塞的愛欲觀變型為對“性”與“愛”的推崇）讓馬爾庫塞感到他們正初步實踐著一種基於本能的本體論革命，它不單可以改善既有存在的社會條件，還能促使人的本能在本質意義上的變革。

其結果就是，同時受海德格爾關於“本真性有本體論的根源”論斷的影響以及新左派思潮的激勵，馬爾庫塞開始激進地號召將變革深入生物維度——重點是意識結構。為此，他重拾起



《愛欲與文明》中“生物學唯物主義”的說法，尋找一種超越發達資本主義運行規律的本體論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本能的解放包含了社會批判和政治反抗的雙重目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激進主義在此完成了具體層面的聯合。³⁰ 就此，馬爾庫塞在人的本質存在中發掘出反叛和革命的動力，並促成人的本質本性與革命解放的聯合。接下來他便在本體論革命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四 結論

通過馬爾庫塞社會批判理論的兩條線索，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自己理論原則的堅持。一方面，他堅守馬克思主義陣地，用歷史辯證法方法論重釋理性、意識、本能與文明、技術與現代性、革命等主題，試圖瓦解那些隱秘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背後的統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存在主義的啟發下，他提出社會批判的“元問題”——人之本質及其生存條件——然後將它置於黑格爾—馬克思傳統下進行改造，為其奠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

儘管馬爾庫塞用這兩條主線架構出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體系，但他在兩者間的猶豫也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困境。誠然，馬爾庫塞憑藉對人性異化現象的有力抨擊，揭露了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邏輯，如若說此舉尚屬成功，那麼他在個人與社會兩個層面之間頻繁穿梭則顯得力不從心。歸根究底，這源於他過分偏重馬克思人本主義的一面，即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依賴，同時忽視了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涉及現實的結構性分析時，他也感受到了這種斷裂，從而提出諸如“新感性”、“感性秩序”、“勞動的愛欲化”等略顯含糊的表述作為“中層理論”銜接，不過這些概念本身也尚待具體化和操作化，它們還遠未達到取代那些複雜精密的社會設置的地步。



馬爾庫塞的經驗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完整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將其割裂看待的做法不僅會導致誤讀，產生各式各樣的“馬克思”（如人本主義的、科學主義的、行為主義的等），還會使自己陷入理論和方法論的困境。這些經驗不斷警惕和啟發著我們，引領我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

注釋

- 1 江天驥，《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4–83。馬爾庫塞，《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李小兵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譯序3–6。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91, 151–153。
- 2 也有學者主張馬爾庫塞的學術生涯始於他的博士論文〈德國的藝術小說〉（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1922）。本文至今沒有英譯全文，只有導言部分的翻譯，收錄於 Douglas Kellner, eds.,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4: Art and Lib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3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50–51。
- 4 馬爾庫塞，〈論具體哲學〉，《哲學分析》，王宏健譯，第01期（2017），25–28，31–32。
- 5 魏格豪斯，《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理論及政治影響》，孟登迎，趙文，劉凱譯（上海：上海人民書店，2010），132。
- 6 馬爾庫塞，《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李小兵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175–176。
- 7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7。
- 8 同上，317–320。
- 9 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
- 10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9–120。



- 11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74), 51–53.
- 12 同上, 80–81。
- 13 同上, 35–36。
- 14 孫飛宇, 〈論社會官能征——現代性與微觀的愛之政治社會學片論〉, 《社會學研究》, 第06期(2012), 32–33。
- 15 芬柏格, 《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 歷史的災難與救贖》, 文成偉譯(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0), 17–18。
- 1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2007), 145–146。
- 17 同上, 151。
- 18 Herbert Marcuse, *Fiv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62。
- 19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72), 16–17。
- 20 轉引自李小兵, 《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 李小兵等譯(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1989), 譯序3。
- 21 沃林, 《海德格爾的弟子: 阿倫特、勒維特、約納斯和馬爾庫塞》, 張國清, 王大林譯(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156–157。
- 22 柏拉圖, 《會飲篇》, 王太慶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3), 57。
- 23 孫飛宇, 〈愛欲與神聖: 佛洛德思想中的單性繁殖原則初探〉, 《學海》, 第05期(2017), 67。
- 24 馬爾庫塞, 〈論具體哲學〉, 《哲學分析》, 王宏健譯, 第01期(2017), 25–27。
- 25 馬爾庫塞, 《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 李小兵等譯(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1989), 106。
- 26 芬柏格, 《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 歷史的災難與救贖》, 文成偉譯(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0), 38–40。
- 27 麥金太爾, 《馬爾庫塞》, 邵一誕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90–94。
- 28 沃林, 《海德格爾的弟子: 阿倫特、勒維特、約納斯和馬爾庫塞》, 張國清, 王大林譯(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177。
- 29 同上。
- 30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9–10。

